

麻爱民◎著

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发展

岁次乙未之仲秋 张运成题



语义语用

的扩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HNYC47.JPG”的词类不断扩展。

第一，与“HNYC47.JPG”搭配的人类（如“人”）

（如“匹”）、**车类**（如“车”）等扩展至其他语义类型（如指类“个”，衣物类“领”）。

第二，与“HNYC47.JPG”搭配的

“HNYC48.JPG”不断扩展，**例如**

与“匹”搭配的

“HNYC48.JPG”由“马”扩展至“牛”。

在这一扩展的过程中，可用于

“HNYC47.JPG”位置的语法化项逐渐

形成一定的语义类型，“人”

“匹”“乘”“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发展

岁次乙未之仲秋张运成题



麻爱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发展/麻爱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61-6640-6

I. ①汉… II. ①麻… III. ①汉语—数量词—汉语史—研究

IV. ①H1-09②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701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汉语个体量词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1)
第二节 汉语个体量词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7)
第三节 研究内容、范围和步骤	(9)
第二章 个体量词通论	(11)
第一节 个体量词的定义和性质	(11)
第二节 个体量词同相关量词的分合	(19)
第三节 个体量词的判定	(25)
第四节 现代汉语常用、次常用个体量词的数量	(27)
第三章 个体量词产生与发展的系统研究	(32)
第一节 先秦	
——个体量词系统的萌芽期	(32)
第二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个体量词系统的发展期	(63)
第三节 宋元	
——个体量词系统的成熟期	(129)
第四节 明清至现代	
——个体量词系统的调整期	(147)
第四章 个体量词产生与发展的个案研究	(155)
第一节 个体量词“只”的产生与发展	(155)

第二节	个体量词“条”的产生与发展	(166)
第三节	个体量词“头”的产生与发展	(179)
第四节	个体量词“张”的产生与发展	(190)
第五章	个体量词产生与发展的专题研究	(200)
第一节	数量结构的发展	(200)
第二节	汉语量词重叠式的历时发展	(209)
第三节	《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个体量词编纂疏误	(216)
第四节	说“花朵”兼谈量词“朵”的词尾化	(222)
第五节	从认知的角度看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发展 ——以“口”为例	(227)
第六节	汉语个体量词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	(237)
参考文献		(248)
附 调查及引证出土文献目录		(259)
后记		(26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汉语个体量词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汉语量词一般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名量词”通常又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不定量词”、“度量衡单位量词”和“临时量词”，后四者往往是表达中必不可少的，是所有语言所共有的，“个体量词”则体现出一种民族性和地域性，是汉藏语系所独有的语言现象。尽管学界对汉语量词的性质、分类等问题还存在很多分歧，但一致认为在众多的量词次类中“个体量词”是最重要也是最有特点的部分。早在1924年黎锦熙写《新著国语文法》时就明确指出：“量词的种类=国语的特点。”^①刘世儒在讨论“陪伴词”时说：“这是汉藏语系所特有的词类，而在印欧语系，作为一种范畴来说则是没有的。”^②王力将量词称为“单位词”，又分“度量衡单位”和“天然单位”两类，他说：“第二种是东方语言所特有的，特别是汉藏系语言所特有的。”^③黎锦熙所说的“量词”，刘世儒所说的“陪伴词”和王力所说的“天然单位”都是指“个体量词”。有个体量词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一带，除汉语外，日语、越南语、朝鲜语等外国语使用个体量词，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藏语、壮语、景颇语、彝语等也使用个体量词，但汉语的个体量词数量之多，使用频率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1页。

②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4页。

之高,称量范围之广,名量搭配之复杂,发展历史之长,是其他具有个体量词的语言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个体量词是汉语词类中最为重要也是最有特点的部分。基于汉语个体量词的特殊地位,我们认为对汉语个体量词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是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以往汉语个体量词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已有的成果多是专书的、断代的、个案的研究,而历时的、贯通的、系统的研究则十分薄弱。笔者统计了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5、2006、2007 三年发表的有关汉语量词的文章共计 256 篇,其中从历时角度讨论个体量词的只有 17 篇,仅占总数的 7%,而且多限于个案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全面的、系统的、贯通性的汉语个体量词发展史研究成果。因而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对个体量词发展史进行系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汉语个体量词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语言类型学意义。近年来,很多学者将是否有“个体量词”作为语言类型学标准,如石毓智认为:“根据数量表达的方式,可以把人类语言分成两大类,一是属于单复数的,一是属于量词的。汉语是后一种语言。”^①徐丹、傅京起认为:“无论是名量词还是动量词,都应该成为类型学研究的一个参数。”他们认为数量结构的位置与动宾语序相关,VO 型语言往往是“数量名”,而 OV 型语言则是“名数量”,而且在同一种语言中,“数词+量词”在名词词组和动词词组里的语序相反,若数量组合处于名词左侧,相对的数量结构则处于动词的右侧,反之亦然,形成两种互相补足的类型^②。刘丹青认为:“世界上很多语言的数词可以直接限制名词,没有汉语那样的个体量词。至于单位量词,常可根据其形态句法表现而归入名词。汉语和一批亚洲语言具有个体量词,这些语言的单位量词和个体量词具有基本相同的语法特点,共同构成‘量词’这

① 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2 页。

② 徐丹、傅京起:《量词及其类型学考察》,《语言科学》2011 年第 6 期。

个大类，在西方文献中被称为分类词（classifier）。在量词语言和非量词语言之间，是有无量词的词类库藏区别。在量词语言之间，是量词库藏是否显赫的问题，其中汉语普通话大致处于量词语言的中间态。”^① 我们认为汉语的个体量词系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结构上经历了“数名”或“名数”到“名数量”再到“数量名”的发展过程，描写这一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无疑会给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一个典型的历史标本。

第二，是建立系统完整的量词发展史乃至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世儒说：“汉语量词，历史悠久，材料浩繁，全面地进行研究，这显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办到的事。因此，我们应该尽先来做断代史的研究。我以为，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儿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否则没有材料，‘游谈无根’，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② 刘世儒是从断代的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刘世儒以后的学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对先秦、两汉、唐代、元代、明代的量词进行断代研究，这都为建立量词发展史奠定了基础。从现有的条件看，我们仍做不到将种类繁多的量词从上至下都描写一遍，建立像刘世儒所说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但先选取量词家族中的一个最为重要、最具特点的小类——“个体量词”，对其进行至上而下的研究，勾勒出汉语个体量词系统发展的脉络，这也可以为将来建立系统完整的量词发展史奠定基础。另外，量词问题既是词汇问题又是语法问题，对于个体量词发展史的系统研究也是将来构建完整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可以纠正现代汉语、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错误观念。现代汉语个体量词是两千多年层层累积而成的，现代汉语的个体量词是“流”不是“源”，要想正确、规范地理解和使用现代汉语个体量词，就不能不重视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事实上，汉语个体量词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和理据性，把握好这些规律和理据，可以推动我们的教学，起到

① 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当代语言学》2011年第4期。

②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

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可以纠正不正确的认识。比如量词的重叠形式问题，很多学者认为“一 A 一 A”的省略形式是“一 AA”。宋玉柱曾对量词重叠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作过总结，认为：“‘一 A 一 A’有它的繁复形式‘一 A 又一 A’，‘一 AA’有它的省略形式‘AA’或‘一一’。这样，这一系列语法格式的全貌就应该是：一 A 又一 A——一 A 一 A——一 AA——AA（或‘一一’）”^①。这种观念如果就现代汉语平面来讲并无不可，但若从汉语史的角度看问题则结论刚好相反，汉语史上个体量词的重叠形式是由简到繁的，其发展序列是：从“AA”发展出“一 AA”，从“一 AA”又进一步发展出“一 A 一 A”，其语法意义也是随着语法形式的复杂而丰富起来的，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汉语个体量词各种重叠方式之间的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语法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详见 5.2）

第四，可以为汉语史分期提供参考。个体量词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量词系统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发展直至稳定成熟的过程。以各代新出个体量词的数量、使用的频率、居于中心词之前的比例、重叠方式等作为标准，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个体量词系统的发展状况和成熟程度，这可以为汉语史断代提供参考。例如，关于近代汉语上限问题是汉语史分期的焦点，可谓众说纷纭，有隋唐说、晚唐五代说、宋代说等不同说法，各位学者从词汇、语法和语音等方面寻找证据，但尚无人提到个体量词，我们从个体量词系统发展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该说“晚唐五代”比较公允，因为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已经有 80% 多的现代汉语个体量词产生了；数名之间使用和不使用个体量词的比率基本持平；数量结构置于名词之前远远多于置于名词之后，前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规范；通用型个体量词“个”已经可以同“指示代词”（“此”、“这”）和“疑问代词”（“那”）结合。与汉代、六朝时期的个体量词系统相比较，晚唐、五代时期个体量词系统有明显的发展，虽然与现代汉语的个体量词系统还有一定距离，尚不能

① 宋玉柱：《关于量词重叠的语法意义》，载《现代汉语语法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 页。

说完全成熟，但已经比较接近现代汉语量词系统了，体现的正是从中古到现代汉语转型初期的特征。所以，从个体量词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支持将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

第五，可以为工具书的编写和修订提供借鉴和参考。汉语个体量词研究固然离不开大型工具书，要借助大型工具书，反过来我们的系统研究又可以弥补和完善大型工具书的不足，对工具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借鉴和参考。如《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是目前最大、最全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汉语工具书，优点很多，但在个体量词编纂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漏收量词词条，量词词目和义项的分合失度，名、量混同，例证偏晚等问题。（详见 5.3）

第六，可以为“问题文献”提供断代方面的参考。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问题文献”在断代方面提供参考，在这方面江蓝生、汪维辉利用有时代特征的“鉴定词”来为“问题文献”断代，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例如《搜神记》，江蓝生认为：“八卷本《搜神记》在语言上有很多反映唐五代以后特点的现象，肯定不是晋干宝所作，有可能出自唐五代或北宋人之手，在内容上，它跟敦煌本《搜神记》共同之处甚多，应是出自同一系统。”江蓝生的考证方法是用了十个“鉴定词”，其中有 6 个语法的：1. 副词“还”。2. 疑问副词“莫”。3. 助词“一来，来”。4. 助动词“要”。5. 人称代词“你，某”。6. “儿，儿家”。词汇方面的有 4 个：1. 遮莫。2. 伍伯。3. 关节。4. 心口思惟^①。后来汪维辉利用时代特征词进一步论定八卷本《搜神记》是“北宋”时期的作品^②。这种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为有争议的语料断代的方法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个体量词的产生、发展有很强的系统性，从系统研究的角度找到每个个体量词产生的具体时代，并进一步确定每种用法的时代，这同样可以作为断代的重要参考，如《赵飞燕外传》，又作《飞燕外传》、《赵后别传》等，旧题“汉伶玄子于撰”，后代学者关于此书的真伪和成书年代存在着很多分歧，现有如下三种说法：第一，“汉代说”，晚明胡应麟云：“《赵飞燕外传》，称河

① 江蓝生：《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中国语文》1987年第4期。

② 汪维辉：《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辑，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08页。

东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谓为伪书，以史无所见也，然文体颇浑朴，不类六朝。”^① 后代赞同此说者不乏其人。如王枝忠同意此书为汉代所作之说，他说：“书至少当为唐以前人所作，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推翻旧说之前，仍宜断为两汉之际的伶玄所作说，但是否即出伶玄之手，因作者情况几无所知，则未敢速下断语。”^② 第二，“六朝说”，近代学者多持此说，如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小说概论》认为文风缛丽，到底不是西汉的作品，大概也是出于六朝^③。第三，“唐宋说”，如鲁迅：“又有《飞燕外传》一卷，记赵飞燕姊妹故事，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司马光尝取其‘祸水灭火’语入《通鉴》，殆以为真汉人作，然恐是唐宋人所为。”^④ 以上说法哪种是正确的呢？从量词入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

谨奏上二十六物以贺：金屑组文茵一铺，沈水香莲心枕一面，五色同心大结一盘，鸳鸯万金锦一疋，琉璃屏风一张，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绿毛狸藉一铺，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龙香握鱼二首，独摇宝莲一铺，七出菱花镜一套，精金彊环四指，若亡绛绡单衣一袭，香文罗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肋发泽一盂，紫金被褥香炉一枚，文犀辟毒箸二双，碧玉膏套一合。

上文所引共出现了16个量词，其中的“面”、“幅”、“座”都是“六朝”时期才出现的个体量词，不见于六朝以前。量词“铺”，据刘世儒考察认为：“这是比较晚起的量词，大约是到了南北朝的末期才出现。”^⑤ 笔者验证刘世儒的说法是可信的。据此笔者认为《赵飞燕外传》成书不会早于南北朝末期，从如此大量地使用个体量词，不要说汉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绝无仅有的，从量词“铺”的用法可知《赵飞燕外传》成书不会早于南北朝末期，很有可能是唐、宋时期的东西，也有可能是经过唐宋人润色过的文献。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6页。

② 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③ [日] 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开明书局1970年版。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⑤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页。

第二节 汉语个体量词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汉语个体量词研究自《马氏文通》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成果是多方面的。在断代研究方面,杨晓敏、黄盛璋、刘世儒、游黎、彭文芳、叶桂彬等的研究,几乎涉及了汉语史的各个阶段。专书研究方面,现有《左传》、《史记》、《齐民要术》等专书量词研究成果约数十种。在利用出土新材料方面,管燮初、沈培、张玉金、马国权、黄载君、王贵元、魏德胜、廖名春、胡继明等利用殷商卜辞、两周金文、战国秦汉简帛、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等出土文献,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汉语个体量词研究。在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方面,如马庆株、邵敬敏运用现代语义学理论对个体量词的动态考察,王绍新、蒋颖对个体量词的虚化以及虚化机制的探讨,石毓智、游顺钊等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个体量词的来源和用法的解释,刘丹青对个体量词所作的类型学分析等,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很有建树。当然,汉语个体量词研究在取得多方面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各种研究不平衡

笔者统计了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了2005、2006、2007三年发表的量词文章共计256篇。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按照“古代汉语”(“古汉”)、“现代汉语”(“现汉”);“专论”(指专门讨论个体量词的)、“泛论”(指不是专门讨论个体量词而是泛论各种量词的);“理论”、“描写”;“历时”、“共时”,两两相对分成四组,统计情况如下表:

量词文章分类统计表

类别	古汉	现汉	专论	泛论	理论	描写	历时	共时
数量	57	199	26	230	63	193	17	239
比例	22%	78%	10%	90%	25%	75%	7%	93%

这个统计大致说明了近年来量词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表现为：古代汉语的研究少于现代汉语，专论个体量词的研究少于泛论性研究，理论性阐述研究少于描写性研究，历时描写性研究少于共时描写性研究，从历时角度专论个体量词发展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了，而从整个系统发展的角度专论汉语个体量词发展的专著尚未见到。

二 对个体量词的界定不清，经常将名词、集体量词、临时量词、准量词等误认作个体量词

张可任曾经对汉语量词的界定问题提出过批评：“现在虽然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承认量词的确有它本身固有的特点，是一个独立的词类，但一接触到具体词语的分析，见仁见智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某些作品（如谈论量词修辞功能的文章），常常把许多本来不属于量词的词，只是由于它们和数词连用、处在量词的位置上，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归之于量词一类。”^① 这种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我们在个体量词研究中也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有些“数名”结构中的“名词”看作“量词”。如：李宗澈的博士论文《〈史记〉量词研究》：“‘种’作为量词是由‘种类’义转来的。用于表示种类。”并举《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为例^②。这里将“种”看作量词是不正确的。《史记》索隐：“五种即五谷也。”“五种”指的是“五谷”，这显然是名词的用法。又如李宗澈将“面”看作个体量词，他说：“《说文》：‘颜前也。’它的本义是‘脸面’，由此引申，凡作用在平面的都可以用它来做量词。”李文列举《殷本纪》“见野张网四面”^③等三个类似的例子为证。这里的“四面”是指“四个方向”，也是名词并非量词。

第二，将有些“临时量词”看作“个体量词”。比如，王绍新将

① 张可任：《关于汉语量词的界线问题——兼评〈汉语量词词典〉》，《辞书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李宗澈：《〈史记〉量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弯”、“钩”、“环”、“轮”看作“个体量词”^①。“弯”、“钩”、“环”、“轮”只能与“月”搭配使用，并具有很强的描写性，只限于用数词“一”或者“半”，不能同其他的数词组合，这是“临时量词”的语法特征。有学者将“一泓春水”、“一叶扁舟”、“一线希望”、“一抹夕阳”中的“泓”、“叶”、“线”、“抹”也看作个体量词，这是不恰当的。

第三，将有些“准量词”看作“个体量词”。陈跃描写了《红楼梦》中的个体量词144个，将“岁”、“分”、“更”、“日”、“月”等“准量词”也看作“个体量词”^②，这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量词更多时候是名词性的，如“一个月”的“月”就是名词，有时进入量词的位置如“一月时间”，这里的“月”是表示“一个月”的时间跨度，是表示实际量的，同个体量词不表量不同。

个体量词是一种封闭的词类，无限度地扩大个体量词的范围的做法既不科学又没有意义。正如马庆株所说：“个体义指向数量结构后面的名词。个体量词表示个体单位，不能就量词本身来确定，否则会不适当地扩大个体量词的范围，这样对于描写没有好处。”^③

三 语料使用问题

语料真实确凿是研究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以往研究在语料的选择、甄别和使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的疏于语料的考订，利用伪书以及年代、版本有争议的语料；有的以孤证立论，缺乏系统的证据链；有的错引文句、误解文意等。这些都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甚至误断了个体量词产生的年代。（详见5.6）

第三节 研究内容、范围和步骤

我们的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量词最为重要的小类——“个体量词”这

① 王绍新：《唐代诗文小说名量词的运用》，载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366页。

② 陈跃：《〈红楼梦〉量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06年，第32页。

③ 马庆株：《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

一范围内，但采用了比较宽泛的标准，将“部分量词”（一层楼）、“种类量词”（一种意见）纳入其中，但不把“临时量词”（一车西瓜、一弯新月）、“准量词”（一年时间）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通论、系统研究、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四部分。通论部分主要讨论个体量词的定义、性质、划分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系统研究是本课题的主体，首先确定可以代表汉语个体量词系统的“常用”和“次常用”个体量词，然后采取从上至下（从殷商卜辞到现代汉语）的顺序考定这些个体量词出现的年代，划分出时代层次，再辅之以各历史时期个体量词的使用频率、数量结构前置率、量词重叠、量词词缀化等用法的变化等，来论定个体量词系统的萌芽、发展以至于成熟的时代。个案研究，主要选取常用的个体量词如“只”、“条”、“头”等，对其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详细描写，进而发现个体量词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规律。专题研究主要是重要问题梳理和规律总结，如：数量结构的发展问题、个体量词词尾化问题、工具书编纂个体量词的疏误问题、个体量词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等。

第二章 个体量词通论

第一节 个体量词的定义和性质

一 个体量词的定义

关于个体量词的界定，有些著作一般只列出个体量词的名目，接着就举实例，并不加以界定，如：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语法讲义》、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等都采用这种办法，现在为数不少的现代汉语教材和著作仍然采用这种只列名目然后举例的方法，学者有意无意地回避，说明界定“个体量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准确、完整的界定。

首先谈谈“个体量词”称谓问题。量词的定名始于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不过黎先生并没有划分出“个体量词”小类，其后的学者在给量词划分小类时多不用“个体量词”这个名称，同“个体量词”相当的概念，高名凯称为“范词”，他举了“一条狗”的例子，并认为：“这里的‘条’字是把‘狗’归纳到‘条’的范围之中，表明其为‘条’类的事物，因此我们就认为此类语词为范词。”^①刘世儒称作“陪伴词”，他说：“陪伴词就是作用只在陪伴名物，不是核算分量的，这是虚量（或把这种量词叫做‘范词’或也叫做‘语尾·类别词’）。”^②王力称为“天然单位”，

①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修订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②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页。

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名词，并将单位词分为“度量衡单位”和“天然单位”二种，从王力所举的例子来看，“天然单位”与“个体量词”大致相当^①。太田辰夫将量词分为“计量”和“计数”两类，关于“计数”量词，他说：“数事物数量时用的量词种类很多，通常在说量词时立即能想起来的，即狭义的量词就是这一类。”从太田辰夫举的例子看，他说的“计数”量词大致相当于“个体量词”^②。而陈望道则称之为“形体单位的量词”^③。较早使用“个体量词”这个名称的是丁声树，他在1961年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说：“个体量词——名词代表的事物，有的是可以一个一个数的。”^④1968年，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也使用了“个体量词”这一名称，认为：“单位词或个体量词也称‘数词附属语’（numeratives 或 numerical adjuncts），因为除了文言以外，数词不能直接修饰名词（比如文言说：‘一马’，不说：‘一匹马’），而中间一定得加上单位词，表示名词的形状、种类、或某种性质。”^⑤

关于“个体量词”的定义，近年来有学者尝试进行界定，下面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开列于下：

杨晓敏：“个体量词表示事物的自然个体单位。”^⑥

吴福祥：“个体量词是计算个体事物的量词，这类量词所称量的事物通常由可数名词来指称。”^⑦

向熹：“个体量词表示个体事物的单位”，“这些事物是可以一个一个数的”^⑧。

范伟：“我们认为，所谓个体量词是指计量对象为具体可感的，可以分别数出来的、在人的意识之中呈现为有界事物的量词，所以它的范围不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4页。

②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③ 陈望道：《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载《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31页。

④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4页。

⑤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河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⑥ 杨晓敏：《先秦量词及其形成与演变》，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9页。

⑦ 吴福祥：《敦煌变文口语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⑧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